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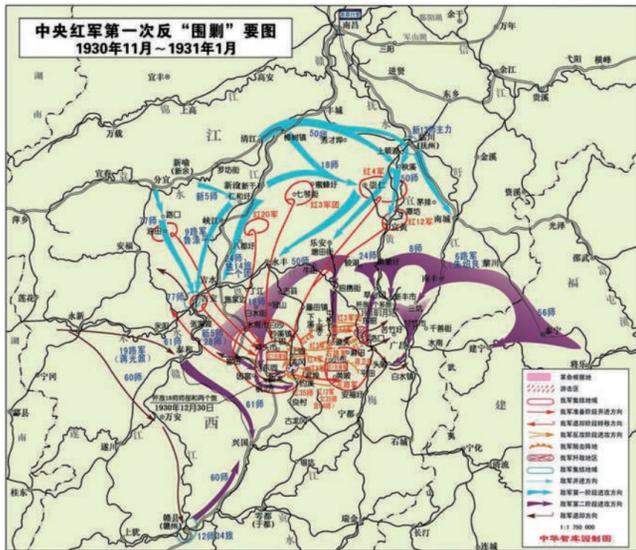
“万木霜天红烂漫,天兵怒气冲霄汉” “诱敌深入”反“围剿”

■薛闰兴 韩丹丹

1930年11月至1931年1月,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毛泽东、朱德的带领下,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,在江西省南部地区,以4万余人粉碎国民党军10余万兵力的“围剿”,共歼敌1个师部、3个多旅1.5万人。此役,是红军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的第一个战役。中央红军第一次反“围剿”的胜利,开创了“工农武装割据”的新局面,确定了中央苏区的革命中心地位,创造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典范。

因敌施策,积极备战。随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壮大和苏区数量的不断增加,1930年8月下旬,蒋介石急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在汉口召开湘、鄂、赣三省“绥靖”会议,确定了以军事为主,党务、政务密切配合,分别“围剿”各苏区红军的总方针。1930年10月,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战胜冯玉祥、阎锡山后,迅速抽调兵力,计划在3至6个月内消灭红军,并令驻江西的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组织对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“围剿”。

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,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基于敌强我弱、敌大我小、苏区尚未巩固的客观实际,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。10月30日,总前委在罗坊会议上通过了这一方针,并决定红军主力东渡赣江,采取“主动退却、诱敌深入、集中兵力、各个歼敌”的战法,在地形、群众条件较好,便于后续发展的赣江以东地区,歼敌于运动之中。据此,中央苏区党、政、军、民迅速行动,抓紧进行政治动员、实行坚壁清野、部署游击战、建立支援红军作战组织等反“围剿”准备工作。
保存实力,待机破敌。11月5日前后,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、总政治委员毛泽东以红3军留在赣江两岸监视敌军,亲率红3军团、红1军团第4、12军等主力部队从袁水流域东渡赣江,向苏区北部地区转移。



中央红军第一次反“围剿”要图。

11月5日,鲁涤平指挥的7个师1个旅编为3个纵队,“并进长追”至袁水流域,均因红军已先期转移而扑空。在得知红军主力东渡赣江的消息后,遂又向赣江以东推进,寻找红军主力决战。为保存实力,红军以少数兵力配合群众武装迟滞、消耗、疲惫、迷惑敌军,主力则于11月中旬分别从赣江以东逐次向苏区中部地区转移,抓紧整训和筹措给养,隐蔽待机。

11月18日,敌军的“尾随追击”再次扑空,又无法抓住红军主力,遂就地转入“清剿”。为彻底“剿灭”中央苏区,12月7日,蒋介石亲临南昌坐镇,将“围剿”兵力增至10万余人,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,由鲁涤平兼主任统一指挥各部,第18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

挥,计划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,由北而南向中央苏区进攻。

集中兵力,适时反攻。针对国民党军11个师2个旅分17个方向实施“围剿”的实际,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认为敌防御线太长,间隙过大,兵力分散,且敌军派系复杂,协调困难。经缜密分析研究,毛泽东认为战场态势已利于红军转入反攻,遂决定采取集中兵力、中间突破、割裂部署、各个击破的战法,就近歼击敌军主力。12月21日,红一方面军主力集中至黄陂、麻田地区隐蔽待机,抓紧进行政治动员和临战准备,同时命令红12军第35师赴兴国东北地区严密监视敌军,并想方设法诱敌西进。

国民党军因进军途中屡遭红军小

股分队和地方武装的袭击、阻击,交通运输线常被阻断,进展迟缓。28日,进至苏区腹地的敌军5个师向红军发起总攻,张辉瓒率领的第18师以1个旅留守东固,以主力向龙冈孤军冒进。红一方面军当即决定以少部兵力牵制北面之敌,集中主力力求歼敌第18师主力于运动之中或立足未稳之时。随即各部队秘密开进,迅速形成“正面攻击、断敌增援、击敌侧背、穿插迂回、翼侧警戒”的战役合围态势。

30日9时许,敌第18师先头第52旅进到龙冈以东小别附近地区,突遭红3军第7师迎头痛击。张辉瓒自恃兵力、兵器占优,先以2个团、后以4个团的兵力向红军实施多路猛攻,均被击退。此时,红4军和红3军团已穿插至敌第18师侧后,切断了敌从西、北方向实施增援和龙冈之敌向西、北方向突围的道路。16时,红一方面军完成了对第18师主力的包围,并从东、西、北三个方向对敌发起总攻。激战至18时许,全歼敌第18师师部及其2个旅,活捉了敌第18师师长张辉瓒。

敌第18师主力被歼后,深入苏区的其他各路敌军闻讯退缩。红军乘胜追击,于1931年1月3日,在东韶附近地区,歼灭敌第50师1个多旅。随后,各路敌军争相撤离苏区。至此,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“围剿”被粉碎。

闻听前方捷报,毛主席诗情勃发,创作了诗词《渔家傲·反第一次大“围剿”》:

“万木霜天红烂漫,天兵怒气冲霄汉。雾满龙冈千嶂暗,声嘶唤,前头捉了张辉瓒。
二十万军重入赣,风烟滚滚来天半。唤起工农千百万,同心干,不周山下红旗乱。”

史说新语

夜歼U-2开先河

■卢克雷 高凯

1965年1月10日夜,1架国民党空军的美制U-2高空侦察机窜我西北地区侦察。我地空导弹部队在U-2途经包头时将其击落,开创了我国夜间击落U-2高空侦察机的先河。这是在U-2加装电子告警和干扰设备后,我军运用“近快战法”夜间歼敌的范例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国民党空军不断利用美制RB-57D、U-2等高空侦察机对大陆腹地进行侦察袭扰。我人民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利用从苏联引进的当时最为先进的“萨姆-2”防空导弹,于1959年10月7日成功击落入侵的敌RB-57D高空侦察机1架,开创了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例,取得了国土防空作战的重大胜利。随后的十余年间,我地空导弹部队与敌围绕侦察与反侦察、干扰与反干扰进行了技术和战术的双重角力。敌通过加装电子告警、电子干扰系统防我地空导弹打击,我通过机动设伏、创新“近快战法”见招拆招,破敌侦察监视。“近快战法”作为实战中吸取多次失利教训,在没有先进电子对抗手段的条件下,大胆突破苏联教令的死板规定,创造出压缩雷达开机距离、快速战斗操作等全新战法,屡屡击落敌机,有效捍卫祖国领空安全。

1964年10月16日,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西部地区成功爆炸。这一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,迅速改变了当时的世界格局。美国为了搞清楚我核武器试验的详情,支持国民党空军加紧恢复对我西北腹地侦察、侦察活动。从1964年10月至1965年1月,敌U-2共入窜大陆腹地11次,其中对兰州、包头地区侦察就达6次。1964年11月26日,一架入侵甘肃兰州上空的U-2因为新加装了电子干扰设备,导致我地空导弹部队抗击失利,侥幸逃脱。因敌U-2增加了红外照相设备,这一时期敌机侦察活动由昼间入窜变为昼夜兼施入窜。

通过对敌侦察轨迹进行分析,发现敌机夜间入窜时通常以大城市为航线检查点,在进入侦察目标前保持一段航线直飞。我地空导弹部队及时调整兵力部署,在甘肃兰州、内蒙古包头附近进行设伏,准备打击入窜兰州、包头的U-2。在此期间,官兵充分发挥军事民主,认真研究敌情变化。在我创新“近快战法”屡战屡胜后,敌又在原先告警设备的基础上,加装了电子干扰设备,使得U-2更加难打。该型电子干扰设备是一套角度欺骗回答式干扰机,当制导雷达开天线时,U-2不仅能自动告警进行空中机动,还可以同步施放干扰,增加地空导弹部队抗击难度。地空导弹部队在吸取前期抗击加装新设备U-2未果的教训基础上,广泛开展“熟悉敌回答式干扰、研究反敌回答式干扰对策”的活动。经过16次战术、技术研究后,我军最终形成了一套解决方案。

在技术上,地空导弹部队通过对记录的回答式干扰图像、波形进行分析研究,发现敌回答式干扰波形特点,并找出了这套干扰系统的弱点,即干扰信号会使真实目标信号滞后,但并不会真正消除真实信号。官兵“以变制变”,提出了利用手动方式跟踪U-2的方法。与此同时,在技术部门的配合下,官兵将制导雷达进行改装,改变天线捕捉和跟踪目标的方式,欺骗敌机电子告警系统,让敌无法告警、无法使用电子干扰设备。

在战术上,为克服制导雷达捕捉、跟踪目标的难题,我军组织指挥所、空情和雷达之间开展协同训练。通过反复苦练,地空导弹各系统操作人员战斗动作配合密切,误差规律摸得清、



现存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美制U-2高空侦察机残骸。

记得熟,练就一开天线就能捕捉目标的硬功。

着眼应对U-2夜间侦察这一“课题”,地空导弹部队大抓夜间实战训练。为让部队尽快适应夜战节奏,提高官兵夜间指挥和兵器操作水平,针对夜间作战特点和夜间训练的短板课题,官兵们加强了夜间标定、装退导弹、天线收发、线路收发、射击准备以及协同训练,并多次组织比武考核,不断提升夜战夜训积极性和必胜信心,并总结出夜战夜训安全组织“三步法”确保练得实、打得着。

前几次侦察都有惊无险,更是增加了敌机的嚣张气焰,为了加快搜集我西北核工业和核设施的相关情报,国民党空军决定继续派遣U-2入窜兰州、包头侦察。我地空导弹部队获悉情报后,接上级命令,于1965年1月10日天黑前完成一切战斗准备,对兵器进行细致检查,确保一切无误后静待U-2来犯。当敌机起飞后,我预警雷达立即捕

获敌机,制导雷达已做好准备听令开机。当U-2进入我地空导弹打击范围后,我立即开机抗击,一举命中敌机,并俘虏敌飞行员,获取敌电子干扰设备和红外夜间照相设备。

这次战果,不仅首开夜歼U-2的先河,更将我地空导弹的战斗运用提升到了一个新阶段。官兵通过击落敌机的技术革新和战术研究,对电子战这一全新作战样式有了新的认识,探索出适合我国武器装备现状的反干扰措施和方法。

未来空袭与反空袭作战,必将在复杂电磁环境下进行,只有对敌人干扰手段的技术体制、运行机理进行深入研究,才能寻敌之短、予以破之,也只有对抗与反对抗的不断推动下,才能使防空作战战法、技术螺旋式发展提升。

链接历史

明清兵学

萨尔浒之战发生在公元1619年。后金军以少胜多,击败十余万明军的围攻。由于明军与后金军在萨尔浒一带的作战非常惨烈,以至于整场战役都被称为“萨尔浒之战”。

凭尔几路来,我只一路去

明朝万历四十四年(公元1616年),努尔哈齐统一女真各部后,建立后金政权。万历四十六年(公元1618年),努尔哈齐宣布“誓讨必征”,随即下达战争动员令。

得知后金军进逼的消息后,万历皇帝匆匆召集文武群臣商讨对策。他任命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,周永春为辽东巡抚,火速赶赴前线。当时,明军在辽东集结各路兵马达8万余人,加上朝鲜援兵1万余人,共计10万余人。由于粮草吃紧、军心不稳,朝廷派出的监军大学士方从哲和兵部尚书黄嘉善,一再催促杨镐抓紧时间进兵。杨镐深知所筹粮草不足以支撑太久,只得寄望于速战速决。明军分为四路,分别由马林、杜松、李如柏和刘綎率领。杨镐要求四路兵马做到“声息相通,脉络相通”,向后金军发起围攻。

努尔哈齐听从明朝降将李永芳的建议,决定采用各个击破的方针,对付明军的多路进攻。其战法,简单概括就是“凭尔几路来,我只一路去”,力图形成局部的兵力优势。在确定作战方针后,努尔哈齐将主力部队1.5万人集中在界首山一带,先迎敌由抚顺而来的杜松,而南路只派500人马防守。

努尔哈齐判定明军必由浑河经过,组织人员对浑河河道情况进行了仔细勘察,并令士卒在上游筑坝蓄水,以水佐攻。负责西路进攻的杜松对当地地理不熟,果然被浑河阻挡。明军渡河时被后金军从上游放水,淹死数千人,大军被一分为二,火炮等重型武器也只能丢弃。面对如此困境,杜松执意孤军深入,他留下大队人马守萨

尔浒,自率一部兵力攻打界凡。见杜松兵力分散,努尔哈齐决定以两旗兵力增援界凡,自己则率其余六旗主力全力进攻萨尔浒。努尔哈齐认为,“此兵破,则界凡之众自丧胆矣”。进攻萨尔浒时,努尔哈齐先令弓箭手对明军大营发射箭矢,随后指挥万余铁骑奋力猛冲。明军重型火炮都已丢弃,气势上处于下风,勉强抵抗一阵后,很快溃败。进攻界凡的明军得知萨尔浒失守,军心动摇,此时后金援军杀到,双方激战至深夜,明军损失惨重,杜松也于此役战死。

行军缓慢的马林听闻杜松所部被全歼,胆气全无,率兵万人向尚间崖(今辽宁省抚顺县哈达附近)集结。努尔哈齐指挥精锐抢占尚间崖,一番激战后,大败明军。随后,努尔哈齐又挥师南下,准备迎接刘綎从南面发起的进攻。刘綎当初在受领任务后,即带领所部由宽甸赶赴赫图阿拉,无奈道路艰险,又遇大雪,行军速度异常缓慢。等到达宽甸富察一带时,已过期日。此时刘綎还不知杜松、马林已经战败,更不知努尔哈齐已经率重兵等候多时。

努尔哈齐得知刘綎大军到来,只留4000人马留守赫图阿拉,其余全部用来设伏。为诱使刘綎冒进,他派人伪装成杜松部下,谎称杜松已经获胜,催刘綎加速前进。刘綎不辨真伪,以为杜松果真已经逼近赫图阿拉,担心杜松独占头功,便下令火速前进,遂全部进入后金军的包围圈。后金军自密林中杀出,明军仓皇应战,最终全军覆没。见此情形,杨镐只得命南路的李如柏撤军。

萨尔浒之战前后不到5天时间,明军虽然兵力占优,却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局面。战争结束后,明军包括总兵刘綎、杜松在内,文武将领阵亡300余人,士卒阵亡4.5万余人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后金军仅损失2000余人。可以说,后金军取得一场完胜,明军则是一场彻底的惨败。

萨尔浒之战是明朝与后金的关键一战。此战过后,明军渐渐失去对辽东的控制,而后金则是越发壮大,彻底掌握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。



辽宁省抚顺市萨尔浒城遗址。

萨尔浒之战的战术与指挥

■熊剑平

双方指挥的得失比较

双方指挥的得失比较

在萨尔浒之战中,双方主帅的指挥能力相差甚远。由于努尔哈齐出色的组织指挥能力,明军的人数和火器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。后金军则充分利用地形条件,发挥其快速机动的特长,使得战争局面发生了根本改观。因为战术得当,努尔哈齐付出极小代价,便取得一场大胜,展示了他杰出的军事才华,比如情报先行、集中兵力、机动灵活、巧妙设伏等等。明军方面则是失误累累,发生将帅失和、用人不当等严重问题。明军主帅杨镐表现得畏首畏尾、不明情况、优柔寡断。在双方交战过程中,努尔哈齐一直亲临一线指挥作战,而杨镐始终在沈阳遥控指挥。

明军选择分兵四路出击,兵力分散已是兵家大忌,加上各部一直各自为战,没有按照预定作战计划组织实施,所谓“脉络相通”根本无法做到,为后金各个击破提供了机会。面对手下各自为战的危境,主帅优柔寡断,无能为力,与努尔哈齐的果敢坚决形成鲜明对比。马林和李如柏贪生怕死,甚至出现没进入战场就要撤退的荒唐局面,对整个萨尔浒战场明军被动挨打局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杜松和刘綎虽作战勇猛,却缺少少谋,最终先后战死。

萨尔浒之战是明朝与后金的关键一战。此战过后,明军渐渐失去对辽东的控制,而后金则是越发壮大,彻底掌握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。